

战略维度和实现路径： 中国共产党百年破解“三农”问题的考察

郑有贵

(中国社会科学院当代中国研究所, 北京 西城, 100009)

[摘要] 中国共产党百年间成功破解一个又一个“三农”难题极为不易。基于大历史观和政治经济学分析,百年间,中国共产党从农民维度、中华民族复兴维度、现代化维度、生产力维度、国际维度把握解决“三农”问题的历史方位和调整完善“三农”政策,探索走出中国特色农村包围城市革命道路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三农”发展道路。其中贯穿百年的主线是解放农民和促进共同富裕、在工业化进程中工农互促、在城镇化进程中城乡互促、以党的坚强领导和强化政策支持破解“三农”发展受弱质性困扰的问题。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三农”发展实现历史性变革、取得历史性成就,充分证明了只有中国共产党才能解决好“三农”问题。

[关键词] 中国共产党;百年“三农”;战略维度;实现路径

[中图分类号] D616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7-5801(2021)05-0040-08

DOI:10.14119/j.cnki.zgxb.2021.05.004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要坚持用大历史观来看待农业、农村、农民问题,只有深刻理解了‘三农’问题,才能更好理解我们这个党、这个国家、这个民族。”^[1]中国共产党百年来解决“三农”问题的历史,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人民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不懈奋斗历史的重要组成部分。在这一历史演进过程中,尽管在不同时期遇到不同难题,但中国共产党始终坚守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和使命,从中华民族伟大

复兴战略全局出发,基于国情、农情探索为农民谋幸福的实现路径,这是能够接续破解一个又一个“三农”难题而实现历史性变革和取得历史性成就的原因。

一、中国共产党解决“三农”问题的 战略维度

中国共产党百年解决“三农”问题的历史,是以人民为中心而解放农民、发展农民的历史;是促

[收稿日期] 2021-06-20; **[修回日期]** 2021-08-09

[基金项目] 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工程重大项目“中国共产党解决‘三农’问题百年道路、伟大成就和基本经验研究”(2021mgc-zd009)。

[作者简介] 郑有贵,中国社会科学院当代中国研究所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教授。

进农业农村现代化发展,进而促进整个国家现代化发展的历史;是朝着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目标不懈奋斗历史的重要组成部分。从大历史观和政治经济学视角分析,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探索走出中国特色农村包围城市革命道路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三农”发展道路,是因为坚守初心,从战略上统筹把握好相关联的农民维度、中华民族复兴维度、现代化维度、生产力维度、国际维度。

第一,农民维度。农业问题,农村问题,农民问题,三者不是孤立的,而是相互关联,其中的核心是农民问题。中国共产党百年革命、建设、改革进程中,始终为农民谋幸福。在新民主主义革命进程中,中国共产党把农民作为革命的主力军,建立、发展和巩固工农联盟,最先是解决农民受压迫、受剥削问题,由领导农民参加农民协会和开展限田、限租、限息,到实行土地革命和建立民主政权,其中最形象、最有动员力的口号是“打土豪、分田地”,使农民生存发展有了基本条件。在社会主义革命进程中,中国共产党在农村领导农民建立土地等生产资料集体所有制,避免了私有制下弱势农民容易失去生存发展依赖的土地而再度深陷贫困(有的国家的失地农民进入城市只能拥挤在贫民窟)。在社会主义建设进程中,中国共产党一如既往地为人民谋幸福。1957年,毛泽东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中指出:“我国有五亿多农业人口,农民的情况如何,对于我国经济的发展和政权的巩固,关系极大。”^[1]中国共产党以土地公有制为基石,坚持农民主体地位,注重保障农民的物质利益和民主权益。在改革开放进程中,中国共产党充分尊重农民首创精神并将其与中央的顶层设计结合起来,这是农村改革能够顺利推进并取得显著成效的重要经验之一。简言之,百年来,中国共产党面对旧中国的制度约束,面对世界工业化、城镇化进程中普遍存在“三农”发展受弱质性困扰的情况^[2],勇于担当使命、攻坚克难,解放农民和破解不同阶段的“三农”难题。

第二,中华民族复兴维度。中国共产党始终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高度来解决“三农”问题,

将解决好“三农”问题作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基础和重要组成部分。在实现站起来的进程中,中国共产党深刻认识并发挥农民在新民主主义革命中的重要作用,以解放农民、建立和发展农村根据地作为战略支点^[3],在解放农民进程中走向全面胜利。早在1922年11月,在中共中央制定的《中国共产党对于目前实际问题之计划》中,基于国民经济以农业为主、农民在全国人口中占绝大多数的经济社会发展阶段,指出农民“自然是工人阶级最有力的友军”“中国共产党若离开了农民,便很难成功一个大的群众党”。^[4]中国共产党解放和发展农民,进而赢得农民对革命的支持,农民成为新民主主义革命主力军,才成功走出了中国特色农村包围城市革命道路,才迎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中国人民站起来的历史性时刻。在实现富起来的进程中,中国共产党深刻认识到解决好“三农”问题在国家经济社会发展中的作用。邓小平指出:“中国社会是不是安定,中国经济能不能发展,首先要看农村能不能发展,农民生活是不是好起来。”^[5]江泽民指出:“没有农村的全面进步,就不可能有我国社会的全面进步;没有农村的稳定,就不可能有我国整个社会的稳定;没有农民的小康,就不可能有全国人民的小康。”^[6]胡锦涛指出:“在我们这样一个农民占多数人口的国家里,农民是否安居乐业,对于社会和谐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广大农民日子好了、素质提高了,广大农村形成安定祥和的局面了,和谐社会建设基础就会更加牢固。”^[7]基于这些战略高度的认识,中国共产党着力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以夯实“三农”基础。在迎来强起来的进程中,中国共产党从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出发,深刻论述了解决好“三农”问题的战略地位。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看,民族要复兴,乡村必振兴。从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看,稳住农业基本盘、守好“三农”基础是应变局、开新局的“压舱石”。构建新发展格局,把战略基点放在扩大内需上,农村有巨大空间,可以大有作为。^[8]基于如此历史方位,中国共产党把全

面推进乡村振兴作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一项重大任务。

第三,现代化维度。不同于传统农业社会的“三农”问题,中国共产党面临的“三农”问题是与以工业化快速推进为特征的现代化联系在一起的,即是现代化进程中的问题。在这一进程中,中国共产党从整个国家现代化发展进行总体把握,统筹全局与局部、长远与当下,推动工业与农业、城镇与农村相互促进。一方面,中国共产党集中力量实施国家工业化战略,进而辐射带动整个国家现代化发展,为解决“三农”问题提供现代生产要素、就业等条件,以提升其发展能力和拓展发展空间。为此,在工业化初期实行农业支持工业,在进入工业化中期发展阶段反转调整为工业反哺农业,实现了“大仁政”前后周期的顺利转换。另一方面,中国共产党从工业与农业、城镇与农村协调发展出发,着力解决工业化、城镇化进程中“三农”发展受弱质性困扰问题,促进农业农村农民现代化,也为工业化发展提供了资金、农产品原料、市场等支撑。在20世纪50年代初至70年代末,中国共产党大力发展农村集体经济,并通过集体统筹和积累实现一定资金积累,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农业支持工业政策下农业农村发展面临的资金短缺问题。70年代末至世纪之交,中国共产党领导和推进乡镇企业大力发展,并用乡镇企业收益支持农业农村发展,即在农村内部先于整个国民经济实行工业反哺农业(当时称以工补农),加之一系列搞活政策的实施,农业农村农民现代化持续推进。在“两个趋向”^[10]理论判断下,中国已进入到工业化中期发展阶段,在整个国民经济中实现农业支持工业向工业反哺农业的政策取向转变。进入新时代,中国共产党全面推进乡村振兴,促进形成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城乡融合发展,促进工农互促、城乡互补、协调发展、共同繁荣的新型工农城乡关系,并采取措施补齐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三农”特别是贫困地区短板,农村同步迈进全面小康社会,并朝着农业高质高效、乡村宜居宜业、农民富裕富足目标迈进。促进工农互促、城乡互补、协

调发展、共同繁荣,是中国共产党破解“三农”问题、实现历史性变革和取得历史性成就不可忽视的因素。

第四,生产力维度。中国共产党一直根据生产力水平制定“三农”政策。百年间,中国共产党面对的“三农”问题是动态变化的,在不同生产力发展阶段,“三农”政策也随之调整完善。工业和农业两个部门间剩余转移政策——农业支持工业或工业反哺农业,就是根据所处生产力发展阶段作出的选择。从国际经验看,在工业化初期,国家较为普遍地选择农业支持工业,而当进入到工业化中期发展阶段后,则将其调整为工业反哺农业。胡锦涛在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上将其概括为“两个趋向”。仅看到这一政策演变逻辑是不够的,还应当看到,工业和农业两个部门间剩余转移是一个大政策,有一系列与之相配套的子政策,进而构成一个大的政策体系。在农业支持工业政策体系中,较主要的子政策有三项:一是农产品统派购制度。制定和实施这一政策的起因,是当时农业生产力水平不高,农产品产出能力低,而快速推进工业化又大幅增加对农产品的需求,导致供给不足问题突出。选择这一政策,旨在保障农产品短缺状况下的有序供给。在后来的实践中,这一政策的实施,还起到保障低价收购工业化发展所需农产品原料的作用。二是农业生产合作化的组织化政策。制定和实施这一政策的初始起因,是为了解决传统农业生产力水平较低情况下农户缺少农具、耕畜等生产要素的问题。在后来的实践中,这一政策的实施,一方面,使剩余由农业部门向工业部门转移更为隐性化,低价统派购农产品也易于实现。正如陈云所指出:“向农业生产合作社进行统购统销的工作,也要容易得多,合理得多。”^[11]另一方面,通过农村集体统筹和积累,实现农业支持工业下的农业农村发展资本积累。三是城乡二元户籍制度。制定和实施这一政策的起因,是作为后工业化国家,为追赶世界工业化进程,优先发展重工业,但由于其属于资金和技术密集型,吸纳劳动力的数量较少,实行城乡二元户籍管理则有限

制农村劳动力过多进入城镇,避免增加工业化成本。这三个子政策制定的起因尽管各异,但在实际上都起到了有利于剩余产品由农业部门向工业部门转移的作用,因而在工业化初期阶段的实践中逐步固化。这一政策体系的形成和固化,为国家工业化战略的顺利实施提供了资本积累和农产品原料供给等保障,是到20世纪70年代末的较短时期内中国能够建立起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的重要原因之一。随着国家工业化的发展,工业具有了较强的自我积累能力,加之国际紧张局势缓和,外国资本随之进入中国,因而从农业提取剩余支持的工业化发展紧迫性极大缓解,进而使自20世纪70年代末起逐步打破上述政策体系成为可能。特别是在世纪之交,中国进入工业化中期发展阶段,在生产水平较大幅度提升的情况下,工业部门有能力将剩余转移到农业部门。换言之,经过几十年工业化的跨越发展,国家有了较强经济实力支持农业农村发展,因而在市场经济进程中实施城乡一体化、城乡融合发展、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成为可能。简言之,在长期实践基础上,中国共产党更加自觉地坚持以生产力为基点制定“三农”政策,把解放和发展生产力作为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坚持以是否有利于解放和发展生产力作为政策制定的出发点之一。从生产力维度考察“三农”政策的制定和调整完善,是梳理中国共产党百年“三农”政策演变的关键。

第五,国际维度。中国共产党在独自解决中国的“三农”问题过程中,也注重考虑国际因素。中国共产党在成立初期,就认识到在帝国主义列强侵略下,外货输入对中国农业农村农民的冲击,并探索相应对策。中共三大通过的《农民问题决议案》指出,自从各帝国主义者以武力强制输入外货以来,一般日用品的价格增高率远超过农产品价格增高率^①,从前的农民副业也全被摧残。这次大会通过的《中国共产党党纲草案》指出,帝国

主义列强在中国取得治外法权、协定关税等优越权利,支配了中国重要经济生活和政治生活;外货输入使农业生产力退步,农民等小生产者渐渐失掉土地等生产资料。“此时中国重要的工业机关,大部分都在列强或军阀官僚手里,很少在中国资产阶级手里;农民正面的敌人,更是列强与军阀官僚,故中国的无产阶级应当最先竭尽全力参加促进此国民革命,并唤醒农民,与之联合而督促苟且偷安的资产阶级,以引导革命到底;以革命的方法建立真正平民的民权,取得一切政治上的自由及完全真正的民族独立。”鉴于此,将“取消帝国主义的列强与中国所订一切不平等的条约,实行保护税则,限制外国国家或个人在中国设立教会、学校、工厂及银行”作为包括18项“最小限度的党纲”的第一项。^[13]新中国成立后,帝国主义在中国的特权被废除,中国共产党在解决“三农”问题上坚持考虑国际因素。面对国际风险,强调中国人要把饭碗端在自己手里,进一步促进农业现代化建设,以提高农产品自给能力。面对激烈的国际竞争,在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运用好“绿箱”“黄箱”等政策工具,以加大对农业的支持力度。同时,学习借鉴国际经验,如在农业社会主义改造过程中,借鉴但又不照搬苏联集体农庄的做法,没有模仿苏联实行土地国有,而是实行农村土地等生产资料集体所有,实现由土地等生产资料的私有制向公有制的重大制度变革。20世纪70年代末,借鉴南斯拉夫农工商综合经营经验,在小范围试行农业向产前、产后延伸,这是后来产加销、贸工农一体化经营(通称农业产业化经营)的先期实践。此外,中国共产党还吸取苏联从农民那里低价拿走太多农产品(即义务交售制)的教训,在统派购农产品时以一定额度为限(如在粮食上实行“三定”,即定产定购定销,且一定三年不变,后又进一步改为一定五年不变,这样在农业增产后集体就可以留下更多农产品,起到鼓励农民增产的作用);吸取资本主义教训,坚持土地公有制;等等。

^①陈独秀在1923年7月发表的《中国农民问题》中,根据农商部统计资料,分析指出外货输入使“一般物价增高率远过于农产品价格增高率”,是当时农业衰退和农民经济地位日益下降以至破产的原因。

二、中国共产党破解“三农”问题的实现路径和成就

以马克思主义为根本指导的中国共产党从成立起,就旗帜鲜明地将实现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明确为自己的奋斗目标。^[14]党的一大通过的中国共产党第一个纲领明确指出,“革命军队必须与无产阶级一起推翻资本家阶级的政权”,“承认无产阶级专政,直到阶级斗争结束”,“消灭资本家私有制”。^[15]中国共产党成立初期就关注农民及其生产生活的困境,寻找困境的成因,探索破解困境的路径。党的三大提出,“拥护工人农民的自身利益,是我们不能一刻疏忽的;对于工人农民之宣传与组织,是我们特殊的责任。”“我们的使命,是以国民革命来解放被压迫的中国民族。”^[16]这次大会通过党的第一个以农民为主题的专项决议,即《关于农民问题的决议案》,在指出农民被鱼肉的基础上,明确提出要保护农民利益。《决议案》指出,“自从各帝国主义者以武力强制输入外货以来,一般日用品的价格增高率远超过于农产价格增高率,从前的农民副业(如手工纺织等)也全被摧残。又自辛亥以后,军阀争地盘的战争连年不息,土匪遍于各地,再加以贪官污吏之横征暴敛(如预征钱粮额外需索等),地痞劣绅之鱼肉把持,以致农民生活愈加困难。因此种种压迫农民自然发生一种反抗的精神,各地农民之抗租抗税的暴动,即其明证,故我党第三次大会决议认为有结合小农佃户及雇工以反抗宰制中国的帝国主义者,打倒军阀及贪官污吏,反抗地痞劣绅,以保护农民之利益而促进国民革命运动之必要。”^[17]其中清晰表明,中国共产党领导农民开展革命斗争,旨在绝大多数中国人民的解放,这是农民利益保障和发展的基础。

百年间,中国共产党基于农民维度、中华民族复兴维度、现代化维度、生产力维度、国际维度等,探索走出了中国特色农村包围城市革命道路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三农”发展道路。其中,贯穿百年的主线是解放农民和促进共同富裕、在工业化进程中工农互促、在城镇化进程中城乡互促、以党

的坚强领导和强化政策支持破解“三农”发展受结构性困扰的问题。

第一,探索形成解放农民和促进共同富裕之路。马克思主义认为,私有制是贫困的根源,走向共同富裕要以公有制为基础。马克思基于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工人生产的财富越多,他的产品的力量和数量越大,他就越贫穷”^[18]经济事实的分析,指出无产阶级贫困源于资本主义制度,要通过消灭资本主义制度消除贫困。恩格斯指出,“工人阶级处境悲惨的原因不应当到这些小的弊病中去寻找,而应当到资本主义制度本身中去寻找。”^[19]中国共产党认识到农民受压迫受剥削缘于封建地主阶级土地所有制,探索解决路径,从限田、限租,到耕者有其田,再到土地集体所有,以此为基础,探索形成基于农村基本经营制度、以共享发展的农业农村组织化促进共同富裕和现代化之路。

第二,探索形成工业化进程中工农互促的发展之路。马克思主义主张工农联盟和致力于缩小工农差别。中国共产党成立初期提出“农业是中国国民经济之基础”(1922年中共中央《中国共产党对于目前实际问题之计划》)、“农业是中国社会的经济基础”(1923年8月25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关于农民运动决议案》)、发展巩固和工农联盟;新中国成立后提出正确处理工业与农业的关系(1956年毛泽东《论十大关系》),实行“以农业为基础、以工业为主导”的发展国民经济的总方针(1962年9月党的八届十中全会)^[20]。进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基于工业与农业关联度提升和产业链的连接,探索形成产业链、价值链一体化联结的产业融合发展之路,促进了“三农”发展空间的拓展。

第三,探索形成城镇化进程中城乡互促的发展之路。马克思主义把消灭城乡差别作为发展目标。中国共产党从当时国民经济以农业为主、农村人口在全国总人口中占绝大多数等基本国情出发,放弃以城市为中心的革命道路的主张,成功走出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割据的中国特色革命道路;新中国成立后,致力于消除城乡差别,推进农业农

村现代化建设;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大力推进农村城镇化,促进农民进城就业创业,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实施乡村振兴战略。随着生产力水平的提高和实践发展,促进城乡融合发展,进而形成城乡相互促进和协调发展之路。

第四,探索形成党的坚强领导和强化政策支持之路。新中国成立前后两个时期的“三农”问题的成因是有差异的。前一时期是制度约束,中国共产党鉴此领导农民运动,引导农民参加革命,农民获得政治翻身,获得土地而摆脱经济上的附庸地位。后一时期是在工业化、城镇化进程中,受农业农村发展能力弱于工业、城镇,中国共产党除发展工业、城镇带动“三农”发展外,还注重对“三农”的投入。如在农业支持工业的时期仍然对农业实行必需的支持。毛泽东在《论十大关系》中辩证地指出,重工业是投资的重点,也要“注重农业、轻工业,使粮食和轻工业原料更多些,积累更多些,投到重工业方面的资金将来也会更多些”。^[21]进入到工业化中期,即在国家经济实力增强后,实施工业对农业、城市对农村的支持,对“三农”的支持水平大幅提升,以解决工业化、城镇化进程中“三农”发展受弱质性困扰的问题,进而形成以国家强大经济实力支持“三农”发展之路。进入新时代,在实施乡村振兴战略进程中,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提出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乡村振兴道路,并明确了包括“重塑城乡关系,走城乡融合发展之路”“巩固和完善农村基本经营制度,走共同富裕之路”“深化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走质量兴农之路”“坚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走乡村绿色发展之路”“传承发展提升农耕文明,走乡村文化兴盛之路”“创新乡村治理体系,走乡村善治之路”“打好精准脱贫攻坚战,走中国特色减贫之路”等在内的丰富内涵。^[22]

百年间,中国共产党接续破解“三农”难题,“三农”发展实现历史性变革和取得历史性成就。1921—1949年,中国共产党面对农民受压迫和受剥削的问题,领导农民走革命道路,与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斗争,在农村包围城市革

命进程中实现翻身解放。1949—1952年,中国建立起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当家作主的社会制度,在全国农村建立起乡(行政村)人民代表大会、乡(行政村)人民政府实现农民当家作主,实行土地改革为农民当家作主奠定经济基础,扫除文盲提高农民文化素质,迅速恢复发展农业生产解决农民缺衣少吃问题,这些都使农民稳稳地立了起来。1953—1978年,中国共产党在农业社会主义改造进程中,面对传统农业生产水平下小规模农户在生产经营中基本生产要素不足的问题,把农民组织到生产合作中,建立起农村土地集体所有制,构建起农村集体统筹和积累机制,进而促进农业现代化建设和生产发展,促进农村文化、教育、医疗卫生事业发展,促进农村基础设施建设,这也为国家工业化提供了所需资金、农产品原料、工业品市场等,对国家工业化作出了重要贡献。1978—1992年,中国共产党面对工业化快速推进下“三农”发展滞后这一重大结构性问题,基于已建立起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实行搞活改革,以增强“三农”发展活力,进而促进“三农”发展。1992—2002年,在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进程中,中国共产党着力促进小农户生产与市场对接,推进“建立以家庭承包经营为基础,以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农产品市场体系和国家对农业的支持保护体系为支撑,适应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要求的农村经济体制”(简称“一个基础,三个支撑”)的改革,促进农业现代化、农村工业化、农村城镇化进一步发展。2002—2012年,中国共产党面对市场经济中城乡差距扩大的问题,基于中国已进入工业化中期的发展阶段,以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为方略,以城乡一体化发展为取向,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扼制了城乡差距扩大趋势,2004年起至2012年实现粮食生产“九连增”和农民收入“九连快”。2012—2021年,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中国共产党探索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乡村振兴道路,面对农业是“四化同步”短腿、农村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短板^[23],发挥中国共产党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的政治优势,全国

一盘棋,历史性地解决绝对贫困和区域性整体贫困问题,农村同步迈进全面小康社会,为实现农业高质高效、乡村宜居宜业、农民富裕富足的愿景奠定了坚实基础。百年间,中国“三农”发展实现历史性变革和取得历史性成就,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人民接续奋斗迎来中华民族站起来、富起来、强起来的重要支撑和重要组成部分,是创造世所罕见的经济快速发展奇迹和社会长期稳定奇迹的基础和重要组成部分。

三、余论

百年间,中国共产党在解决“三农”问题道路探索中,实行了一系列政策演变。解决“三农”问题进程中政策的“变”与“不变”,有其历史逻辑,要历史地、辩证地认识。其中,不变的是中国共产党为农民谋幸福的初心和走共同富裕道路,变的只是实现初心和共同富裕的实现方式以及具体政策工具运用,而这种变化又是基于当时生产力水平及历史场景等因素的选择和调整。

中国共产党百年解决“三农”问题实现历史性变革和取得历史性成就,充分证明了只有中国共产党才能解决好“三农”问题。其中的原因很多,起主导作用的有:一是只有中国共产党才能真正做到以人民为中心,解放农民,确保农民的主体地位,充分尊重农民的首创精神,充分发挥

农民在制度创新和农业农村发展中的作用。“三农”问题缘于其发展能力相对于工业、城市的弱质性,受此困扰,农业农村发展与工业、城镇发展相比有些滞缓。中国共产党对农民并没有忽视,而是将解决好“三农”问题摆在治国理政的突出位置,着力促进“三农”发展。二是只有中国共产党才能站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高度,从实际出发,处理好全局与局部、长远与当前发展的关系,在现代化进程中推进不同生产力水平发展阶段“三农”问题的解决。三是只有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才能发挥社会主义制度的优势,以解决工业化、城镇化进程中“三农”发展受弱质性困扰的问题。其中,在中国共产党坚强领导下,充分发挥国家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所具有的能够“全国一盘棋,调动各方面积极性,集中力量办大事”的显著优势,上下同心,齐心协力攻坚克难,打赢脱贫攻坚战,补齐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进程中贫困短板。

更为可贵的是,百年间,“三农”发展也陷入过困境,但中国共产党为农民谋幸福的初衷不改,因而能够以极大勇气正视困难,并在实践中日益成熟,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实现理论创新发展,增强驾驭“三农”工作的能力。这深刻地反映出,中国共产党百年解决“三农”问题实现历史性变革和取得历史性成就来之不易,所积累的经验极为珍贵。

[参考文献]

- [1][9]习近平在中央农村工作会议上强调坚持把解决好“三农”问题作为全党工作重中之重促进农业高质高效乡村宜居宜业农民富裕富足[N].人民日报,2020-12-30.
- [2][21]毛泽东文集:第7卷[G].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219,25.
- [3]郑有贵.问题视域下新中国70年“三农”的转型发展[J].当代中国史研究,2019(5).
- [4]郑有贵.中国共产党解放农民和赢得农民的统一[J].宁夏社会科学,2021(4).
- [5][12][13][15][16][17]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一九二一—一九四九):第1册[G].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198,282—284,248,251,253,1,277,263.
- [6]邓小平文选:第3卷[G].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77—78.
- [7]江泽民文选:第1卷[G].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259.
- [8][10]胡锦涛文选:第2卷[G].北京:人民出版社,2016:287—288.

- [11]陈云文选:第2卷[G].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239.
- [14]本书编写组. 中国共产党简史[M].北京:人民出版社,中共党史出版社,2021:14.
- [18]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G].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40.
- [19]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G].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368.
- [20]戚义明. 以农业为基础、以工业为主导方针的逐步形成和最终确立——基于〈毛泽东年谱(1949-1976)〉的考察[J]. 毛泽东研究,2016(4).
- [22]十九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G].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9:141—156.
- [23]习近平关于“三农”工作论述摘编[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9:5.

(责任编辑 安 之)

Strategic Dimension and Realization Path: The Investigation of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to Solve the Problem of "Agriculture, Rural Areas, and Farmers" in One Hundred Years

ZHENG Yougui

Abstract: In the past one hundred years,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successfully cracked one after another "three rural" problems. Based on an analysis of great historical view and political economics,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from the dimension of farmers, the revival of the Chinese nation dimension, modernization dimension, productivity dimension, and international dimension has grasped the historical position, solved the problem of "agriculture, rural areas, and farmers" and made "three rural" policy adjustment, and explored the rural including urban revolution road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and the "three rural" development of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In the past century, the main themes have been to liberate farmers and promote common prosperity; to promote mutual support between industry and agriculture in the process of industrialization; to promote mutual support between urban and rural areas in the process of urbanization; and to overcome the problems regarding the low-quality development of agriculture, rural areas, and farmers with the strong leadership of the Party and strengthened policy support. Under the leadership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historic changes and achievements have been made in the development of agriculture, rural areas, and farmers. This provides a profound answer to the question that only the CPC can solve these problems.

Keywords: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One Hundred Years of "Agriculture, Rural Areas, and Farmers", Strategic Dimension, Realization Path